

特别策划

金星熠熠生辉，军旗猎猎飘扬。刚刚过去的8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7个建军节。文化周刊特别邀请几位军旅作家，讲述他们军旅岁月里的动人故事。让我们以美文回望赤诚与荣光，砥砺奋进与梦想。

他，点亮的那一盏灯

有人问寿富为何对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此用心？他笑呵呵地说：“我也出生在革命老区，能为有困难的老区孩子点盏灯，我感到很幸福……”

丁晓平

再过两三年，寿富入伍就满40年了。寿富中等身材，精明能干，乐观和善，第一次见面就让人觉得很亲切。寿富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当过勤务兵、做过炊事员，后来上了军校，学会了写新闻报道。他当过班长、排长、指导员，一步一个脚印，从大山沟里来到了首都，走进了总部机关，扛上了大校军衔，成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骄傲。

寿富的家乡在盛产百合花的革命老区江苏盐城，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虽然家庭经济紧紧巴巴，但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乐善好施、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就像父母种在地里的庄稼，从小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2007年某个夏日的周末，战友小聚，无意间说起他们将同江西省团委合作搞一个“手拉手心连心”资助贫困留守儿童的项目，向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孤儿伸出援手。寿富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项目实行认领制度，自愿选择一至两名儿童，资助1200元学习生活费用。在完成一系列规定流程后，寿富认领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女孩名叫刘嘉雯，5岁时父亲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母亲改嫁，她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正在井冈山罗湖区学校读小学一年级。男孩名叫曾院君，比嘉雯大两岁，家住井冈山七乡杨坑村，正读小学三年级。小院君的童年同样是艰难的，在父亲不幸身亡后，母亲改嫁又因遭遇难产不治身亡，院君成了孤儿，只能跟随伯父伯母一家艰难度日。老区孩子的遭遇，深深刺痛了寿富的心。

那年月，寿富父母年近体弱，女儿正面临小升初，小家庭的日子全靠精打细算。但是，面对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两个苦孩子，寿富真是二话没说。他第一时间跟妻子商量，妻子上了话没说就全力支持寿富，女儿也支持他奉献爱心。

不日，寿富收到了井冈山两位小朋友们的来信。虽然这样的回信也是活动的规定动作，是嘉雯、院君在老师指导下写的一封信感谢信。但收到感谢信的寿富，在孩子们歪歪扭扭的笔迹里带着感情和温度的文字中体会到了另一种幸福，内心更加增添了一份责任。

按约定，资助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交

完扶植资金后，即获得江西省团委颁发的一张大红证书，就算完成了慈善之举。寿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一次性”的善举，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将爱心延续。

冬去春来，在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下，寿富20年如一日地支持两个孩子，学杂费、生活费、医疗费、考试费、交通费……只要孩子来信了，寿富便一分钟也不耽搁。经济支持之外，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成长烦恼，寿富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孩子们的生日到了，北京寄出的礼物就像长着翅膀似的飞到了井冈山。嘉雯和院君不仅把寿富当作亲人，还把寿富当作知心朋友，有了烦恼找寿富诉说，有喜悦也第一时间与寿富分享。

在寿富的资助和鼓励下，院君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井冈山中学。可是因为家庭贫困，他不愿心看着伯父一个人在地里苦苦苦收，在读完高一上学期后，就辍学偷偷跑到福建打工去了。暑假结束了，又到开学季，寿富打来了电话，询问学习情况，才得知院君放弃了学业。寿富既生气又难过，因为他知道，这不是孩子的错。于是他拨通了井冈山中学校长的电话，希望与学校一起劝院君返校学习。校长获悉院君家庭的困难后，决定免除他的学费。就这样，院君又回到高中继续读书，寿富全额资助他的生活费用，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读书，努力考上大学。

转眼间，院君18岁了。受到寿富的影响，院君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军，做像寿富一样的光荣的军人。于是他把他6个提前批志愿全部填报了军校直招士官定向生。这还不算，在高考结束还没有公布成绩的那几天，院君为了能够实现从军梦，又跑到武装部悄悄地报了名，希望来个“双保险”。

7月28日，这天井冈山的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傍晚时分，正在井冈山茨坪镇打工的院君，突然接到了井冈山市武装部曾科长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前几天参加的直招士官定向生的体检结果出来了，红细胞数值略偏高，需要他参加个别项目的复检，时间紧急，必须在第二天早上8时30分前赶到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接到电话，院君有些懵。要知道，茨坪镇距离吉安市市区约有147公里。此时天色已晚，公交车已经停运了。出租车也打不到。院君先是请同学卢双骑摩托车把他送到了吉安市泰和县碧溪镇溪岩村所在的321省道路口。那时，时针已指向22时，剩下的路，他只能靠步行！

行进时，寿富刚好打电话给院君。寿富知道后，一边安慰院君不要着急，一边鼓励他继续前进，叮嘱他注意看路上有没有顺风车，同时告诉他要节约手机电量，保持通讯畅通，每一个小时给他发短信报个平安。就这样，院君在寿富的远程陪伴下，走

一会儿，跑一会儿。山一程，水一程，伴着星星，伴着月亮，还有那耳畔阵阵呼啸的山风，以及密林深处鸟兽的鸣叫……院君似乎忘记了恐惧，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心中只装着一个信念，向前进！

每过一个小时，他就准时收到来自北京的短信，寿富的每个字仿佛就像一盏灯陪伴着他。他仿佛看到，道路的尽头，太阳冉冉升起！

第二天早晨7时，院君终于赶到了吉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那一年的8月9日，院君的梦想实现了，他被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提前录取，成为火箭军导弹维修专业直招士官定向生。喜讯传到北京，寿富为他高兴，也叮嘱他道：“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好好干，将来用优异成绩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让寿富欣喜的是，院君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勤学苦练，砥砺追梦，很快成长为学员队骨干。如今，院君大学毕业入伍，成为一名士官，当上了技术骨干，立志要成为新时代优秀的“驭剑人”。而那位同样得到寿富帮扶的姑娘刘嘉雯，在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结婚成家，并决定跟丈夫一起回家乡打拼。寿富满心欢喜，带着夫人从北京赶到井冈山参加了婚礼，为她的事业和家庭送上祝福。

有朋友问寿富为何对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此用心？他笑呵呵地说：“也许这就是缘分，我出生在革命老区，能为井冈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奔小康出出力，为有困难的老区孩子点盏灯，我感到很幸福。一路走来，不仅我的家人支持我，身边的战友、同学们也很热情，他们或赠礼物，或购文具，参与了这场爱心的接力。”寿富对我说，他相信，爱可以传承和传递，可以生发出无尽的力量。

寿富长我4岁，兵龄早我三载，在新时代军队改革期间带头转变为文职人员。不久前，在国防大学培训期间，我与寿富成为同班战友，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得知上述故事，深感敬佩，心生仰望，遂作此文以记之。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现任解放军出版社纪委书记、副总编辑，大校军衔。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天津图书奖、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水龙吟·海天千里

刘蒙

海天千里一色，送目随天远无际。怒潮澎湃，抚琴倾诉，面迎风絮。细闻鸥声，遥知万里，激弹思绪。长啸涛声没，拍栏欲起，谁能会，海无语。

甲子岁月如梭，忆当年狼烟四起。一万万两，水师未归，浪沉海底。羞为武夫，未能胜敌。今恨犹在！何重蹈覆辙？“红中翠袖，搵英雄泪。”



刘蒙，刘伯承元帅次子，少将军衔，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军武官等，曾获芬兰总统授予的一级骑士勋章。爱好文学和书法，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

《天空与海》

端木紫/摄



看着他们夫妻二人老去的身影，近40年的军旅生活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流过。那些发生在杨柳青的往事，那些光阴中的聚散离合，坎坷欢乐，令我热泪盈眶。

杨柳青，总关情

侯健飞

中国幅员辽阔，古镇星云密布，而古镇之古，在历史，在文化，也在武备。

“津西门户”——天津西郊古镇杨柳青，京津冀战略重镇，自宋金“界河之战”始，到1948年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设立，其间战火催生、朝代更替之事都在古籍史著中，如果不是当年入伍在杨柳青，我此生也只能欣赏杨柳青年画，绝不会写下《杨柳依然青青》这样的散文。此文是悼念同乡战友海峰，和我一同入伍，死后就葬在杨柳青，算来已经12年了。

当然，杨柳青于我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虽然知心战友海峰去世了，虽然老部队早已移防他地，但在老营房旁边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武叔武婶还生活在那里。武叔已经81岁，武婶也七十有六，但有他们在，杨柳青才真正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有他们在，不幸早逝的战友海峰、张广、于永江和卢明生前的故事就一次次被记起，令人唏嘘。

武叔大名武汉珍，当年是杨柳青某桥团的工程师，人瘦而高，面目温和，沉默寡言。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承德市辖两个县近500名新兵入伍舟桥团。三个月新训还没结束，就有很多新兵知道武工是承德县人，等我知道了武工是老乡时，多名战友已经改称武工为武叔了。但是不久，同乡战友背地开始盛赞武叔。那时，舟桥团分南北营房，营区简陋，家属房建在南营房，只有三排平房，东西走向，西边是围墙，东边紧挨着特务连宿舍楼，直线距离也就六七十米。武叔是副团职，有三个孩子，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中间一排最东头的三间房子里。

身处异乡的人们难免怀旧。军人汇集边关大漠，来自五湖四海，同乡情谊作为军营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古今概不例外。入伍第二年，我在特务连当炊事员。由于刀工面活功夫不佳，就负责烧火。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点火。五点钟，火烧旺了，我就推开伙房后门，坐在台阶上胡思乱想。伙房后门正对家属院，这时我就会看到早起的武叔忙里忙外。武叔有一头乌黑的卷发，眉清目秀，那条短款花布围裙总是清清爽爽。

其实，我早已熟悉武叔一家五口人，只是由于性格原因，从未主动接近他们——我何尝不想结识武叔，但看到那么多同乡战友经常出入武家，特别是周末，武家人来人往，就感到不应该再打扰他们。

1986年八九月间，同乡战友洪中告诉我，北京军区后勤某处处长给武叔打电话，要找一名学历高、写字好的战士去机关帮助工作。武叔推荐了已经在团里出名的字画才子洪中。但洪中另有想法不愿意离开，于是向武叔推荐了我。由于武叔不认识我，洪中就在一天晚上带我去拜访武叔。不巧那天武叔不在家，武叔热情接待了我们。

第一次到武叔家去，我很拘束。洪中说明来意，武叔那双明亮如星的眼睛，立即看穿了我自卑又倔强的内心。当武叔听说我13岁就失去母亲，家里只有一个64岁的父亲后，锐利的目光瞬间蒙上一层雾水：“你和卢明一样，都是命苦的孩子。你怎么不上家里来？不知道我们是老乡吗？”我嗫嚅，武叔随即又对我说：“小侯，你这样见外可不行，以后你有空就上家里来，想吃啥给你做。”武叔把一个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老武今晚加班，去北京帮助工作的事情，回来我和他说。”

第二天上午，我背着背包到团部。武叔站在已经发动的吉普车旁边。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见武叔，赶紧敬礼：“武工好！”武叔向我举举手，笑着说：“你婶和我说了，你很优秀，去了好好干，一年半载就会回来。有事随时打电话。”



侯健飞，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教授，大校军衔。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

想不到的是，我从此告别了杨柳青舟桥团。两年后我入军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此时，洪中、卢明、张广等七八个同乡战友改转志愿兵，他们在四五百名农村籍同乡战友中表现出色，部队培养加上自己努力，他们如愿以偿跳出了“农门”。

以后，我虽然与武叔武婶很少见面，但彼此联系越来越密切。就在我军校毕业不久，最残酷的事情落在武家，武叔武婶最疼爱的儿子在18岁时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

看到丈夫日渐消沉，武叔擦干眼泪，一次又一次对武叔说：“人死不能复活，你一个大男人，还是军人，整天眼泪来眼泪去，不振作起来，像什么话？”儿子去世几年后，我与武叔见面，他老去很多，但依然热情、健康，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说到儿子的离世，武叔说：“多亏有你们这些小老乡，这几年你来我往，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我挺过来了，你叔也挺过来了。”武叔的“你们”让我越发自责。那个小不了我们几岁的小弟去世时，在北京忙于工作的我，其实没有帮到他们什么。

2021年5月7日，转业回承德又下岗多年的战友卢明因病不幸离世。武叔武婶一家五口，从杨柳青驱车赶到卢家已近午夜。看到停在门口的棺材，早已泪流满面的武叔下车，在长女红和小女梅的左右搀扶下，踉踉跄跄走了过去。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滴在了棺木上……

她的疼，我们都懂。卢明生前对我说过，他早已把武叔当成母亲。“武叔的为人处世，影响了我一生。”其实，作为一个名军嫂的武叔，她对我们这些同乡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尽心尽力？转业在天津的同乡战友张广，38岁患上尿毒症，看病、资助，直至病逝后事安排，都是武叔出面帮忙。另一个退伍留在杨柳青成家的战友于永江，还是武叔为妈妈。但永江亦不幸早逝，留下妻子，还是武叔一家全力照顾……

今年卢明三周年祭日的时候，武叔武婶从杨柳青赶回了承德，却已无力爬到山顶卢明的墓前。当我们从山上下来时，等在山脚的武叔还在默默垂泪。她哭肿的眼睛还是明亮如星，那头染黑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81岁的武叔瘦了，他低着头，安静地站在武叔身旁，像极了一株老松。

看着他们夫妻二人老去的身影，近40年的军旅生活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流过。那些发生在杨柳青的往事，那些光阴中的聚散离合，坎坷欢乐，令我热泪盈眶。我不禁在心底念道：“亲爱的武叔武婶，我想告诉你们，无论是过世的张广、于永江、卢明，还是活着的洪中、李强和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孩子！”

那枚不变的针线包

那枚针线包，时刻提醒着我当兵的起点和初心，也见证着那些有坎坷有荣光的军旅岁月……



张国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历任《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武警大校军衔。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等50多个奖项。

张国侯

我办公桌上的台历盒里一直放着一枚顶针，一次，一位地方媒体的女记者采访我，惊讶地问道：“您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物件？您会用吗？”哈哈！何止是会用，我都用了几十年了。不光是我，我们当兵的都会用它。”

她笑笑说：“军人真是全能型的。”

“倒不是军人全能，而是军人所处的环境要求我们必须能妥善应对任何特殊情况。”就拿这个顶针来说，我已随身带了20多年。若要追溯起来，我当兵的时间，还要从入伍时说起。

1978年冬天，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在家里，衣服鞋子的问题，都是母亲帮我操持。到了部队后，第一次发衣服就随被装发放了一个小包包，我好奇地打开，看到里面装的有针、有绿色和白色两种棉线，还有一枚顶针，和俺娘手指上天天戴着的一模一样。我问老兵为啥还要发这些针头线脑的家伙伙？老兵反问我：“你的衣服破了怎么办？”

果然，一个月的高强度训练后，我们成为正式的解放军战士。战士的重要标志是军装上戴帽徽和领章，那时的帽徽上有别

针，能直接别在帽子上。而领章上却没有现在的魔术贴，需要用针线把它们缝在衣领上。针线包就有了用武之地。

我有模有样地拿出针，又拽了一段足够长的白线，第一个步骤是将线往针鼻儿里穿。平时拿枪舞棒的手指头僵硬得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捏住了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了一身汗，终于将线头穿进针鼻里，哪知刚往外一拉，用力过猛，那线又从这边跨了出来。班长看我作难的样子，就走到我跟前替我穿针引线，他同样是那种穿法，只一下就将线头对准了针鼻儿，动作轻松而娴熟。

穿上线后，他说：“看好了，照我的样子做。”他拿过左领子上的领章，按在军装上衣左边的领角上，边按边给我说缝领的要领：“领章的边沿要和领子的边沿相差零点五毫米，不能对齐，更不能出沿，缝的时候，针扎在领章边沿线的内侧，可以在领子一侧露针脚，决不能在领章上露针脚。”

王班长是1976年入伍的，安徽淮北人，个头很高，没想到他干起针线活来，那叫一个动作麻利，让我眼花缭乱的十几次穿针引线后，领章就被他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地缝在了衣领上。缝完后，他看着我惊讶不已的我说：“右边的领章就由你自己来完成。按我刚才做的示范动作，一定能缝好。”

我从他手里接过了针线，照着班长刚才的样子，先戴上顶针，再把领章放在领子上，再把他缝的左边领章和右边这个领子并齐，确定前后左右都完全相同了，拧紧领子和领章，将右手里的那针就扎了下去。谁料这一针不偏不倚，穿过领子就扎在了我自己的食指上，都说十指连心，当时疼得我倒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我知道，无论多难，我都必须自己完成，因为离开家之后，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担当的，早适应永远比晚适应好。

入伍第一年，从年初开始南方就有了战事，所以我们训练起来就有随时上战场的紧迫感，为了上战场后少流血，平时就要

拼命多流汗，按照实战要求搞训练。打战术时，哪里地形最“毁衣服”，连长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打，最常去的就是乱石滩、蒺藜坡、泥水沟等，因为这些地方更符合战场要求，要在那里做各种匍匐前进、抵近射击。

棉质的军装哪里禁得起这样摸爬滚打，很快多处都“开了花”。衣服烂了舍不得换新的，就打补丁。打补丁就要用到针线包，加上缝衣服、缝鞋子、缝扣子，有一阵子几乎天天都能用上针线包，那枚顶针也早被我戴得明晃晃的了。

1979年7月，母亲到部队来看我，发现我军装的肩膀处磨烂了一个洞，非要我让我脱下下来给我补一补，我说不补，我自己会补。她听了以后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我在家时从来没学过缝衣服。为了证明我能行，我从班里拿来针线包，很麻利地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一个口子给补好了。

母亲笑着说：“没想到部队还教你们做针线，这样我以后也就放心了。”

我自豪地说：“部队不光教我缝衣服，套被子、打补丁、缝扣子……这些战士们每个人都会做。”

不久，我发现针线包还有另外一个用途，不但能缝衣服，还能挑水泡。一次连队组织长途拉练，走路时间长了脚底就起泡。晚上班长给我们新兵端来热水泡脚，然后从针线包里拿出缝衣针，在火头上燎一燎，对准脚上的水泡就挑了起来，针尖刺入，水泡里面的血水流出来后，脚底板上感到一阵轻松。原来这挑水泡也是部队的一个传家宝，新兵常被班长的这个贴心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部队条件越来越好，缝缝补补的活儿我们干得不如以前多了。

但我在办公室量放针线包的习惯一直没改。这不仅是因为，随时随地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更因为，那枚针线包，似乎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陪伴，它提醒着我当兵入伍的起点和初心，也见证着那些有苦有甜、有坎坷有荣光的军旅岁月……